

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 不平等关系研究新动态

周丽萍 杨波*

摘要: 跨境数字贸易的高效性、低门槛和边界弱化等特性正在重塑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为缓解和诠释在空间、行业和企业维度上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来,有关国际贸易、跨境数字贸易和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为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非均衡关系的评估奠定了基础。本文从跨境数字贸易的概念嬗变、特征与衡量方法,国际贸易、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因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基于此,本文研究发现跨境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引力模型、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国际贸易的衡量方法等可能不再适用,而且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双向影响尚未得到经验证实。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跨境数字贸易的新特征、估计方法及其与收入不平等的反向因果关系等方面进行延拓。

关键词: 跨境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收入不平等;数字技术

近年来,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该问题在全球经济论坛上得到探讨,它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Yap et al., 2018)。而关于贸易的政治讨论也已从对经济利益的关注转向对不平等、失业、错位等问题的聚焦。随着数字技术与贸易全球化的融合,跨境数字贸易方兴日盛。由此,国际贸易受企业规模、产品类型、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的制约逐渐变小,或许有益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然而,“数字不平等”、网络引起的马太效应^①等却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因而,为了抓住跨境数字贸易新机遇、突破跨境数字贸易新挑战、缓解收入非均衡,挖掘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厘清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颇具现实价值。

就理论层面而言,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为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李嘉图贸易理论宣扬的比较优势虽然作为贸易分工和利得的重要原因,但其认为,只要需求上存在相对差异,各国都会从贸易中获益。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HO)贸易理论及其框架下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 SS)定理在非单一生产要素的假设下对李嘉图模型加以拓展。SS定理的一种含义是贸易自由化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

*周丽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hcdxkykzlp@qq.com;杨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yangbo21cn@163.com。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编号:18ZDA038)和湖北省技术创新专项软科学项目“湖北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科技创新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ADC13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及编辑部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网络外部性会放大群体对个体的从众影响力,进而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黄璐, 2018)。而数字技术能够降低进出口门槛,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提供更多跨境交易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跨境数字贸易在收入分配上的平等性。

收入不平等,因为贸易可以增加相对充裕要素的实际报酬(Lin and Fu,2016)。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似乎与这一预测相矛盾(Lee and Wie,2015)。而且,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由于非技术密集型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没有下降,贸易不可能通过 SS 机制对工资不平等产生任何影响。近年来,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些理论的可优化之处,为此细化了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多国多产品、企业异质性和劳动力异质性等。总体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对收入不平等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但少有文献关注跨境数字贸易的成本优势、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递减及网络外部性等可能左右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新特征,因此,这一“谜题”尚待深入探索。

为了进一步切合现实地探讨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一些学者将视线转移到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这是因为收入不平等在许多地区愈演愈烈,而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此二者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是正还是负相关?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引起的?更细致地,学者们关注的是,相比传统国际贸易,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存在哪些区别,以及跨境数字贸易是否难以满足现有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而且,伴随国际贸易研究的不断微观化和细化,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网络外部性等被引入研究框架中,结论是偏向马太效应,还是门槛效应?为此,本文系统综述了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联系的相关文献,着重解决二者关系的研究难点和分析传导机制,揭示现有文献的缺口,为收入不平等较严重国家或地区以及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跨境数字贸易的研究进展

跨境数字贸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数字网络经济的创新与竞争的探讨。而后,关注跨境数字贸易的学者日渐增多,跨境数字贸易的引入给予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和模型新的血液。由此,近来相关文献逐渐增多,主要聚集于跨境数字贸易内涵界定、跨境数字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异同点以及跨境数字贸易的衡量方法三方面。

(一) 跨境数字贸易的内涵界定

1. 数字贸易定义的演进

数字贸易的界定历经从狭隘到广泛的过程。最初的数字贸易是指完全数字化的贸易。如 Weber(2010)提到,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化手段传输有价值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活动,数字产品或服务的内容是数字贸易的核心。然后,人们是以交付方式为界来定义数字贸易的。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 2013 年 7 月提出,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固定线路或无线数字网络交付产品和服务。这一定义包括美国国内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但不涉及大多数实体商品中的商业。^①再拓展到从订购、生产和交付方式来判定数字贸易。如 2014 年 8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完善了之前定义的数字贸易,认为数字贸易是基于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在实际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商品的生产、订购和交付中发挥重要作用。^②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7)指出,广义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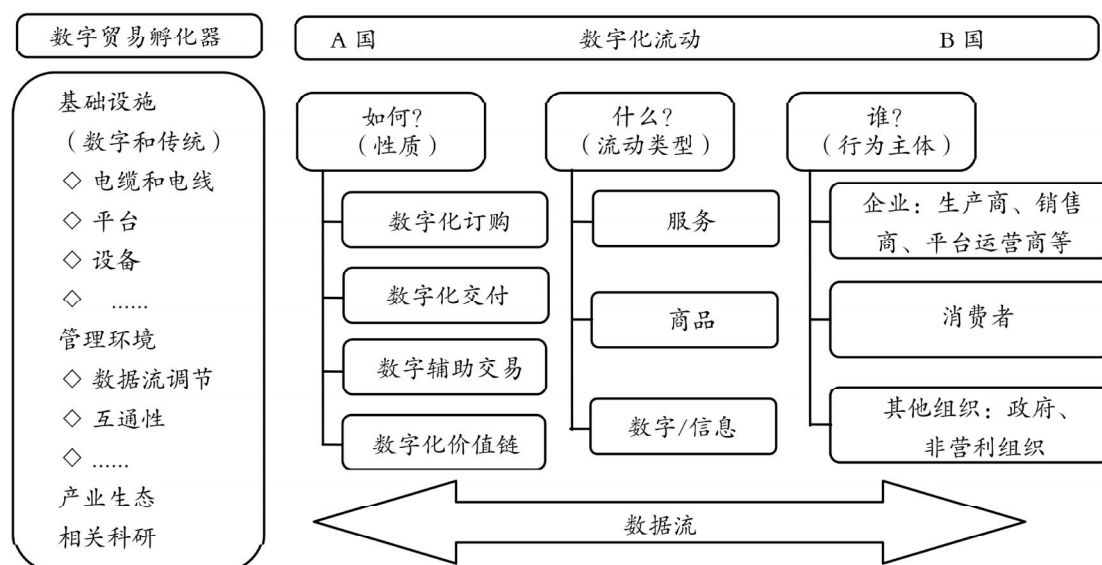
^①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013.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https://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15.pdf>.

^②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014.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85.pdf>.

数字贸易不但涵盖个人消费品的网络交易和在线服务的供给,还涉及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和智能制造服务的实现,以及其他平台和应用。^①从梳理的数字贸易定义来看,该概念的范畴在不断扩大和细化,外延内涵越来越丰富了,这也是学界对数字贸易的研究愈发重视的原因之一。

2. 跨境数据流的界定

跨境数字贸易的关键驱动力是跨境数据流(国际商会,2016)^②,而这里的“数据”指的是什么?从图1可知,跨境数字贸易是数据以多种方式在国家间流动的基础上实现的,数据流能以每分每秒甚至任何时间以数字形式流动的字节(byte)来衡量。揭开“数据”的神秘面纱,在通信过程中,它其实是经过加密的0和1组成的一串数字。美国商务部经济和统计管理局(2014)将数据流按内容的商业特性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纯粹的非商业性通信;第二类是企业或其他相关方之间交换的商业数据和服务;第三类是以市场价格在买卖双方之间交易的数据流;第四类是以0美元的市场价格向终端用户提供或从终端用户提供的数字化的数据和服务。^③可见,数据流的显著特征是高效和边际成本递减(黄璐,2018)。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建构后每增加一个用户或每增加数据流动字节所需费用基本为0。从根本上讲,跨境数字贸易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数据的汇编、转移和使用,这为跨境数字贸易活动提供了经济价值。但同时也涉及隐私、信任和安全等问题(Aguerre,2019),因此这一系列新问题亟待各个击破。总体来看,跨境数据流是基于数字交换技术的通信数据在不同关境有约束的流动序列。



资料来源:借鉴 Fayyaz(2018)等,并整合与拓展。

图1 跨境数字贸易的初步框架

^①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Key Barriers to Digital Trad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7/march/key-barriers-digital-trade>.

^②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16.“Trad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 Primer on Global Data Flows for Policymakers.” [https://www.iccmex.mx/uploads/businessbulletin/agosto2016/post/Trade%20and%20Date%20flows_20July%202016%20\(002\).pdf](https://www.iccmex.mx/uploads/businessbulletin/agosto2016/post/Trade%20and%20Date%20flows_20July%202016%20(002).pdf).

^③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2014.“Digital Economy and Cross-Border Trade: The Value of Digitally-Deliverable Services.”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migrated/reports/digitaleconomyandcross-bordertrade.pdf>.

(二) 跨境数字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异同点

1. 相同之处

跨境数字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共性是比较多的。马述忠等(2018)概括了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相同之处:交换行为的本质、内在动因以及经济意义。然而,跨境数字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相同点不仅限于这三方面,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交易主体均具有“跨境”的特征(Fayyaz, 2018)。因而,二者均可能面临不同国家的购买习惯、法律和语言等差异,还会涉及国际形势和跨境物流等风险。第二,跨境贸易均会增加物品的多样性。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生产力等具有异质性,因此不同国家提供的商品也不尽相同。第三,开放贸易皆有削弱市场势力的作用。跨境数字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均属于开放贸易范畴,都会增加市场的竞争,特别是,跨境数字贸易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入者和买家,极大地加剧了本已异常激烈的竞争(Deng and Wang, 2016)。

2. 不同之处

正如马述忠等(2018)所提炼的,与传统贸易相比,数字贸易的时代背景、时空属性、买卖双方、交易标的、运作方式和监管体系均有所不同。此外,少数学者对跨境数字贸易的特征进行了概述:一是贸易结构不同(Xing, 2018),数字技术改变了服务业的不可贸易性,为服务业收入的拓展提供了帮助。二是贸易成本更低(Lin, 2015),既包括更低的距离成本、搜寻成本、固定成本、复制成本及核实成本,还有渠道扁平化带来的成本优势。三是进入门槛较低(裴长洪、刘斌, 2019),跨境数字贸易为中小企业甚至个人提供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更多渠道和方式,从而可能缩小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四是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更快、更广,例如教育类数字产品的贸易,以其价格低廉、传播迅速和市场范围更广等优势,或许能弥补知识和创新外溢困难而导致的收入非均衡,但由于知识边缘的溢出使创新更具生产力,因此知识共享可能加剧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Grossman and Helpman, 2018)。但归根结底,跨境数字贸易的核心要素是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衡量方法的依据。

(三) 跨境数字贸易的衡量方法

1. 跨境数字贸易的间接度量方式

大部分文献将数字技术作为代理指标。从衡量标准来看,不少文献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的相关指标来间接说明数字贸易(Chung et al., 2013),但缺乏结合商业界对ICT的使用情况衡量。于是,Yushkova(2014)选用了商业互联网使用程度指数,这一指标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计算的网络就绪指数的一部分,它能更好地衡量经济领域中ICT的作用。不过,较少研究进行分类和汇总。而Ozcan(2018)却将ICT指标归类和加权汇总为:综合ICT发展指数和三个细分指数(ICT接入指数、ICT使用指数和ICT技能指数)。但由于双边国际贸易数据与单边数字技术数据难以匹配,因此施炳展(2016)采用了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量。Xing(2018)则使用的是2014—2015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世界经济论坛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中国家*i*和国家*j*的B2B和B2C的互联网使用程度。但问题在于,适于研究跨境数字贸易的数据的时间跨度太短,因而可能不宜用于分析收入不平等。而且跨境数字贸易不能简单采用互联网使用程度来衡量。此外,孙浦阳等(2017)采用DID(双重差分)和DDD(三重差分)方法间接估计了电子商务价格。但在企业层面跨境数字贸易的衡量上,国内相关研究严重不足。

从内生性等问题来看,Wang 和 Li(2017)使用 2000 年的 ICT 数据作为 IV 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原因在于这一工具变量不仅能预估 2013 年的 ICT 发展水平,而且不受 2013 年贸易额(因变量)的影响。在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中,Vemuri 和 Siddiqi(2009)利用 Hausman 和 Taylor 的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面板数据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还有部分文献采用滞后一期的互联网指标作为 IV 变量(胡浩然等,2020)。而李兵和李柔(2017)使用 PSM-DID 方法较好地处理了选择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从而得到更为可信的研究结论。

2. 跨境数字贸易的直接衡量方法

从跨境数字贸易的定义出发,一些实证研究试图以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代理变量来缩小与真实数据的差距。Hortaçsu 等(2009)以网上实物交易为研究对象,他们使用 eBay 和 Mercado Libre 两家大型在线拍卖网站的交易数据分析个体间贸易的地理格局。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对比线下贸易,估计方法也不够严谨。

近年来,关于在线贸易的研究大都是在引力模型的鞍点路径上逐渐拓展的,因而常常与“距离的消亡”(death of distance)有关。如 Lendle 等(2016)比较了地理距离对 eBay 和总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他们认为,在 eBay 上距离的影响平均要小 65%,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搜索成本的降低。Gomez-Herrera 等(2014)使用的是一般在线消费者调查,他们调研了距离对于有形商品的在线交易是否仍然重要,但其研究对象与特定的电子商务平台无关。令人叹息的是,近几年这方面的文献比较匮乏,而且大多停留于描述性统计。如 Ma 等(2018a)使用 BizArk 的跨境电子商务托管服务数据库,构建了中国出口电子商务繁荣和风险程度的指标体系。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选用数字产品贸易来衡量。如 Aguiar 和 Waldfogel(2018)针对文化产品数字贸易的研究,他们用受欢迎程度的衡量标准(用户对电影作品的评级)来为每一部电影作品的潜在价值构建代理变量。虽然衡量方法多种多样,但当前跨境数字贸易的研究仍较匮乏,这与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不相称。

二、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

前期大多数研究主要分析了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研究表明国际贸易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收入不平等,并且作用方向存有争议。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复杂,以下两方面是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 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模型演进

1. 经典理论模型的演进

从劳动力作为单一生产要素的李嘉图模型开始,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就已经对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埋下了伏笔。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理解贸易和收入不平等之间联系的主要框架诞生,即 HO 模型中的 SS 定理。SS 定理在非单一生产要素的假设下对李嘉图模型加以衍生。与李嘉图模型不同,HO 模型假设贸易主要是由要素禀赋的不同而产生的,该模型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率的提高扩大了工资差距,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加大。相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往往是非技术或低技术密集型商品。因此,非技术或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率上升,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缩小(Polpibulaya, 2015)。与这一预测不同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

的加剧却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如 Lee and Wie, 2015)。然而,基于 HO 框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指出,贸易自由化将促使进出口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皆趋于均等化。但是,不少关于工资与贸易的研究结果与此结论并非一致。相对而言,特定要素理论模型从短期视角分析了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贸易有益于出口部门增收,不利于进口部门的收益。

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谜题”让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收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而不仅仅是简单的 SS 预测。第一种模型的演进方式是扩展简单 HO 模型;第二种是引入技术进步相关变量(如 Rattsø and Stokke, 2013);第三,更重要的是,随着贸易在中间品和垂直专业化方面的增加,一些文献选用连续中间品模型,但仍在 HO 框架内。伴随新新贸易理论的不断深入,近期许多研究均采用了企业异质性模型(如 Helpman et al., 2010),甚至将企业和工人的异质性均引入模型中(如 Grossman and Helpman, 2018)。然而,直到最近,关于国际贸易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一直受到 HO 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的影响。

2. 跨境数字贸易相关模型的拓展

许多相关研究均是基于国际贸易引力模型而构建的。具体而言,Chung 等(2013)根据引力模型中的距离涵义,将进出口国的每种 ICT(即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与距离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纳入具有固定效应的引力模型中。这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方法,这种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给定进口商的所有出口商的变量(如 GDP 或 ICT 变量)或给定出口商的所有进口商的变量可能与特定国家的虚拟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不能包含在模型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Yushkova(2014)将进出口国的 ICT(即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交互项引入引力模型。此外,Xing(2018)进一步丰富了数字贸易的代理指标,他的研究包括五个与 ICT 有关的基础设施指标和两个电子商务互联网使用指数(即贸易双边国家的 B2B 和 B2C 电商使用指数)。但鲜有研究控制进出口国人口数量的影响,因此,Ozcan(2018)将贸易双边的 ICT 指数和人口数均纳入引力模型中。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不仅反映出数字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在不断拓展,以及相关研究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和实证模型也在不断完善,而且为跨境数字贸易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

(二) 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关系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现有研究都聚焦在国际贸易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上,鲜有分析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双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文献。

1. 国际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

在技术方面的相关研究中,许多文献建立在 Melitz(2003)首次提出的理论洞见之上,即贸易将市场份额从效率较低的企业转移到效率更高的企业。为了探究其中缘由,不少学者将贸易、技术与收入不平等三者联系起来。Helpman 等(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搜寻摩擦、议价和甄别的模型,他们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支付的工资越高,而出口增加了具有给定生产力的企业支付的工资。Van Reenen(2011)的研究表明,贸易通过提高生产率创造了额外的动态收益,但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Grossman 和 Helpman(2018)将企业和工人的异质性引入到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发现贸易使得每个国家的工资不平等程度都高于封闭经济,但长期来看这些国家的创新率和工资不平等程度都与“自给自足”

时相同。

从制度层面进行探究的文献,如 Akerman 等(2013)发现,瑞典劳动力市场机构是通过集体工资协议来抑制企业间工资差异的。Lin 和 Fu(2016)提出,贸易导致专制(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减少(增加)。Antràs 等(2017)认为贸易提高了总收入,但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需要通过扭曲的所得税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再分配。此外,他们的定量结果表明,贸易导致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增加侵蚀了约 20% 的贸易收益,而如果通过非扭曲性手段进行再分配,贸易收益将增加约 15%。

从教育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献,如 Blanchard 和 Willmann(2016)探讨了教育政策和贸易保护在影响收入和人力资本分配方面的潜在作用。Zakaria 等(2016)也提到了教育、城市偏见和政治民主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Danziger(2017)开发且校准了具有内生技能需求和供给的动态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他发现消除美国的贸易壁垒将使美国的总收益增长 4.5%。然而,工人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年龄和出生群体。这也体现了在教育、年龄和出生群体上的收入不平等。此外,近年来陆续有大量研究从其他影响渠道进行了分析,如金融开放(Lim and McNelis,2016)。总之,与贸易有关的不平等和贫穷问题涉及了多个影响机制。

2. 收入不平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相对而言,收入不平等反向影响国际贸易的研究颇少。Katsimi 和 Moutos(2011)考察了不平等程度变化对进口需求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发现进口、收入、相对价格和不平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适用于总的实际进口,甚至细分类别。谢建国等(2015)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进口需求存在差异化影响,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参与率的不同组合将导致一国具有不同的国际收支倾向。Chan 等(2016)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各种估计量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显著降低了消费,从而增加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Nguyen(2017)考虑到不平等在形成国际贸易舆论方面的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公民未能将收入不平等与外贸政策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贸易导致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

纵观相关研究,关于国际贸易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经验和理论文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方面文献大多是从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角度展开分析的,换言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贸易和技术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大。然而,与这二者密切相关的跨境数字贸易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近乎缺失。另外,近年来,收入不平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种突破肇始于学者们试图打开收入不平等与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黑箱”。不过,收入不平等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仍然比较匮乏。

三、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观点差异

在全球化贸易失衡和我国正推进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探究收入不平等与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但以往关于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跨境数字贸易的研究,尤其是相关实证研究,仍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关于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学者们各抒己见,持不同观点。

(一) 乐观态度

1. 宏观层面的不平等

一些学者指出跨境数字贸易有利于缩小国家间不平等。如 Terzi (2011) 指出电子商务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短期来看,收益可能集中在发达国家,但从长远来看,发展中国家可能从中受益更多。Horowitz (2015) 的文章中提到,数字贸易不应被视为赢家和输家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向各个方向扩大全球贸易的方式。Meltzer (2015) 认为,由于互联网允许在网上搜索和交付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不少传统的贸易壁垒也正在得到克服,如基础设施差、物流效率低和距离市场远等。Gravier (2018) 认为,无论是成熟的经济体还是冉冉升起的新兴经济体,数字经济都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就业机会。Gnangnon 和 Iyer (2018) 发现,通过更高程度地融入世界商业服务市场,互联网距离^①的缩小有利于弥补地理距离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8) 预计未来 15 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后发经济体赶超提供机遇。

2. 微观层面的不平等

一些学者和组织探讨了跨境数字贸易对微观层面收入均衡化的裨益,主要焦点在于供应链、行业、企业和个人等角度。

从供应链和行业角度探讨的文献,如 Meltzer (2015) 的研究指出,因特网允许企业参与供应链,例如提供分散的任务或服务。互联网已成为企业与消费者和供应商沟通、在云端访问 IT、从众筹网站筹集资金、向全球转移数据以管理生产计划或与位于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的重要工具。因此,由于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范围还扩大到为传统上在国际创新和竞争力水平上被边缘化的人和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Rukanova 等 (2018) 同样认为,在供应链中,采用跨越组织和系统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为了减少信息的分散,从而提高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和效率。Fefer (2018) 提出,数字技术可能影响传统货物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提高生产力或降低与贸易流动有关的成本和壁垒,如供应链跟踪、3D 打印或通过物联网连接的装置或物体。通过电子商务 (例如 eBay)、社交媒体 (例如 Facebook) 和云计算 (例如亚马逊网络服务) 等方式,数字化渗透到每个行业部门,为已有的和新的参与者创造了挑战 and 机会。

从企业和个人角度分析的文献,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2014) 的报告指出,数字贸易有利于沟通、加快商业交易和改善资讯的获取,因此,它不仅有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还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② 国际商会 (ICC, 2016) 提到互联网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使小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与大型企业相同的工具进行竞争。^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2017) 的报告提及,由于数字连通性不断增强而导致信息障碍逐渐下降,使得更多的实体或传统贸易得以实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特别是

^① 在 Gnangnon 和 Iyer (2018) 的文章中,“互联网距离”是指国家互联网使用强度与世界平均互联网使用强度的比率。

^②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014.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85.pdf>.

^③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16. “Trad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 Primer on Global Data Flows for Policymakers.” [https://www.iccmex.mx/uploads/businessbulletin/agosto2016/post/Trade%20and%20Date%20flows_20July%202016%20\(002\).pdf](https://www.iccmex.mx/uploads/businessbulletin/agosto2016/post/Trade%20and%20Date%20flows_20July%202016%20(002).pdf).

对中小企业而言,进而缩小企业间差距。^①而且,不少学者认为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对中小企业(SME)尤其有利(MacLeod, 2018),它可以帮助中小企业与国外采购商建立跨境订单联系,并提供出口所需的支持服务,包括简化付款和物流。不仅如此,中小企业参与跨境数字贸易,能充分发挥配送速度、柔性化、差异化和小规模生产等优势,进而弥补跨境贸易零售业所需“碎片化”订单(裴长洪、刘斌, 2019),以此获得新的收入机会。此外, Lipton 等(2018)探讨了数字贸易货币(digital trade coin, DTC),应用分布式分类技术的数字贸易货币可以用作大量潜在用户的交易工具,包括中小企业和个人。这就意味着在交易工具方面也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的发生率。

(二) 担忧态度

1. 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从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角度考虑的文献,如 Noh 和 Yoo(2008)在纯交换代际交叠模型的框架内提出了分析见解,认为对于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采用互联网对增长的隐含影响是负面的,因为“数字鸿沟(digital gap)”阻碍了互联网带来的经济增长。时隔十年, MacLeod(2018)的论文中提出了人们的四大担忧: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处在“数字鸿沟”阶段或缺乏熟练工人,这会使得跨境数字贸易左右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第二,数字贸易可能会产生网络效应,这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反竞争威胁,而且会致使发达国家市场高度集中;第三,数字贸易可能更便于允许国际公司通过转让定价扭曲其应纳税收;第四,数字技术可能会抑制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制造业的积极性,如 3D 打印和提高自动化,减少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需求。尽管数字贸易给予中小企业和个人前所未有的进出口机会,但数字贸易发展可能对创新企业更有利(Seuba et al., 2018),这对于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来说或许是噩耗,进而扩大企业间的差距。

2. 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反向因果关系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不平等”,这种信息时代的新现象将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差距,而且经济发展与信息和技术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Liu et al., 2017)。针对其反向因果关系提出见解的文献,如 Ono(2005)研究亚洲的“数字不平等”,结果显示收入、教育和性别是国家数字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Lendle 等(2016)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以及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距离效应差异最大,表明部分差异可能反映出“国际”买家的选择。Ma 等(2018b)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对全球数字化海关有一定的挑战。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持正面态度。跨境数字贸易的极速发展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Alcácer et al., 2016)。因而,在新的国际贸易生态系统中利用跨境数字贸易服务等,更容易与全球市场建立联系,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包容性就业(Ma et al., 2018b)。从这一角度来看,跨境数字贸易为商业和创业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为解决持续发展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然而,它也带来了许多挑战,从全球数

^①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Measuring Digital Trade: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easuring Digital Trade.” 22–24 March, OECD Headquarters, Paris. https://unctad.org/meetings/en/Contribution/dtl_eWeek2017c04-oecd_en.pdf.

字鸿沟到潜在的负面社会问题。^① 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之谜有待深入探究,这也是近年来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联合国的重要目标包括消除赤贫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和两性平等。然而,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上,其与跨境数字贸易的联系在较大程度上被忽视。

四、结论与展望

既有文献对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探究,为我们进一步剖释跨境数字贸易的内涵及其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提供了大量理论基石和实证参考。就理论研究进展而言,跨境数字贸易内涵由狭义向广义逐渐转化,收入不平等类型由国家层面向中微观层面不断细化,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从经济因素拓展到非经济因素,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之谜的分析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变。诸多以往研究有益于我们厘清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内生机理。但纵观前期研究,跨境数字贸易仍然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相对边缘的问题。实际上,跨境数字贸易已经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新兴贸易模式与传统国际贸易存在显著异质性。

(一) 简要结论

1. 跨境数字贸易的假设需重塑

引力模型和新新贸易理论是目前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研究的重要支撑,有关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大多基于引力模型和具有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然而,这方面文献很少涉及跨境数字贸易,换言之,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理论体系中的假设在跨境数字贸易问题中不一定满足。

在部分理论已难以符合跨境数字贸易现实基础的情况下,有必要重塑相关假设:一方面,与引力模型假设相背离。跨境数字贸易已经逐渐促使“距离消亡”(Lendle et al., 2016),因而为偏远地区带来出口机遇,那么,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变量可能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渐渐失效,甚至因此而使经济规模的影响也锐减。另一方面,与新新贸易理论假设相背离。其一,生产率门槛假设,跨境数字贸易为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带来出口契机,这些企业能利用出口零售市场上所需“碎片化”订单获得收入(裴长洪、刘斌, 2019),进而导致生产率门槛弱化,也部分解释了“生产率悖论”;其二,出口沉没成本假设,数字技术促进了买卖双方信息的完全和对称性,从而减少了搜寻买方、了解和研究国外市场时的沉没成本(Lin, 2015),因而不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出口沉没成本假设;其三,生产要素假设,跨境数字贸易中,数据是新的、主要的生产要素,并且,由于网络资源生产的无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因此数字产品的贸易不再满足边际要素成本递增假设(黄璐, 2018)。

2. 跨境数字贸易的度量需完善

关于跨境数字贸易的衡量,传统国际贸易的衡量方法不再适用。事实上,IT技术可以彻底改变传统服务业的低效率和不可贸易性(江小涓、罗立彬, 2019),因而在跨境数字贸易中较为重要的服务贸易却往往被低估,如若找到度量跨境数字贸易的合适方法,将在某种程度

^①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Chapter 4 -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ttps://worldinvestmentreport.unctad.org/world-investment-report-2017/chapter-4-investment-and-the-digital-economy/>.

上弥补这一缺陷。

然而,由于商业利益和微观数据收集困难,跨境数字贸易的官方数据不足,因此很多学者采用的是间接度量方法。大部分文献采用数字技术作为代理指标,如电话(电话线和移动电话)的数量、因特网主机的数量、个人电脑的数量、电话服务的价格和等待时间、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垄断以及租用线路和数据线等(Vemuri and Siddiqi, 2009),部分学者结合商业界对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使用情况、利用相关指标进行归类和加权汇总,以及采用双向网址链接数量、双边 ICT 指标(施炳展, 2016; Xing, 2018)。度量方式越来越贴近跨境数字贸易的现实情况,但大部分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是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而且,这些衡量方法无法区分估计结果是数字技术的直接效应,还是通过影响跨境数字贸易而带来的间接效应。

在直接衡量方法上,一些文献试图以跨境电子商务或数字产品作为代理变量来缩小与真实数据的差距(如 Aguiar and Waldfogel, 2018),衡量方法多种多样,但当前跨境数字贸易的研究仍较匮乏,这与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不相称。而且直接衡量法收集的数据时间维度不够长,不太适合用于研究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3. 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不足

第一,缺少符合跨境数字贸易的理论基础。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如 Grossman and Helpman, 2018)。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跨境数字贸易在全球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收入不平等与跨境数字贸易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但与此同时,这种新兴贸易模式的以往研究较少,而且现有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考虑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要素,由此推导出的许多结论与跨境数字贸易研究可能存在差异。

第二,关于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不足。囿于企业层面跨境数字贸易的保密性较强和官方数据较少,大部分相关研究仍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针对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方面,少数学者采用实证模型分析了跨境数字贸易(如 Deng and Wang, 2016),但目前暂时没有检索到关于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第三,关于收入不平等对跨境数字贸易的影响分析匮乏。学者们更关注的是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但事实上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可能只有收入较高的人群进行跨境数字贸易。而对于较贫困地区,受到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的影响(Lendle et al., 2016),并且贫困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和个体都属于风险厌恶型,不敢或者不会选择这种新模式进行交易。这意味着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二) 研究展望

其一,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模型。现有相关理论模型主要从传统的国际贸易角度展开,部分模型考虑到了互联网因素,但缺少关于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框架。将跨境数字贸易的新特征,如成本优势、技术外溢迅速、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递减、网络外部性以及网络虚拟性等引入研究模型,进一步完善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从而得到更符合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果。

其二,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尽管一些学者意识到了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不平等存在的影响,但由于跨境数字贸易的界定尚未统一和微观数据匮乏,目前这方面的经验证据不足。其实,不妨借鉴双重差分法的思想间接评估跨境数字贸易对收入

非均衡的作用,但难点在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确定以及时间的划分。

其三,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反向因果关系。一方面,鲜有学者关注收入不平等对跨境数字贸易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作为影响因素难以运用 DID 方法。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收入不平等对跨境数字贸易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其反向因果关系也有待证实。随着跨境数字贸易数据的逐渐完善,将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符合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定量研究涌现。

本文梳理了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新动态,着重阐述了相关领域的内涵演变、测度方法、因果关系机制以及多种观点。对于跨境数字贸易的认知,部分学者已经了解到跨境数字贸易的重要性。在理论分析方面,对于数字贸易的内涵、时代价值、交易壁垒、国际规则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国内一些研究已较具前瞻性。然则,这与近年来跨境数字贸易几何式增长态势并不相称。此外,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假设、模型框架和经验分析尚不成熟。而在实践中,跨境数字贸易作为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高效性、低门槛、边界弱化等特性正在重塑全球贸易竞争格局,对个人、企业、行业、国家甚至全球的收入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收入不均也会左右跨境数字贸易的均衡发展。总之,随着数字技术日趋渗入以及国际贸易边界逐渐弱化,跨境数字贸易与收入不平等联系愈发紧密且复杂,亟待进一步延拓相关机制,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2018:《未来 15 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管理世界》第 12 期。
2. 胡浩然,张盼盼、张瑞恩,2020:《互联网普及与中国省内工资差距收敛》,《经济评论》第 1 期。
3. 黄璐,2018:《网络经济中的消费:发展、演化与企业对策》,四川大学出版社。
4. 江小涓、罗立彬,2019:《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5. 李兵、李柔,2017:《互联网与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经验证据》,《世界经济》第 7 期。
6.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2018:《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第 10 期。
7. 裴长洪、刘斌,2019:《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经济研究》第 5 期。
8. 施炳展,2016:《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第 5 期。
9. 孙浦阳、张靖佳、姜小雨,2017:《电子商务、搜寻成本与消费价格变化》,《经济研究》第 7 期。
10. 谢建国、赵锦春、林小娟,2015:《不对称劳动参与、收入不平等与全球贸易失衡》,《世界经济》第 9 期。
11. Aguerre, G. 2019. “Digital Trade in Latin America: Mapping Issues and Approaches.” *Digital Policy,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21(1): 2–18.
12. Aguiar, L., and J. Waldfogel. 2018. “Netflix: Global Hegemon or Facilitator of Frictionless Digital Trade?”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42(3): 419–445.
13. Akerman, A., E. Helpman, O. Itskhoki, M. A. Muendler, and S. Redding. 2013. “Sources of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214–219.
14. Alcácer, J., J. Cantwell, and L. Piscitello. 2016.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New Era for Places,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5): 499–512.
15. Antràs, P., A. de Gortari, and O. Itskhoki. 2017.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Wel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8: 387–412.
16. Blanchard, E., and G. Willmann. 2016. “Trade, Education, and the Shrinking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9: 263–278.
17. Chan, K. S., V. Q. T. Dang, T. Li, and J. Y. C. So. 2016. “Under-consumption, Trade Surplu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3: 241–256.
18. Chung, K. C., P. Fleming, and E. Fleming. 2013.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Fruit and Vegetables in APEC.”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7(2): 117–130.

19. Danziger, E. 2017. "Skill Acquisi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Trade-induced Inequ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7: 60–74.
20. Deng, Z., and Z. Wang. 2016. "Early-mover Advantages at Cross-border Business-to-business E-commerce Portal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12): 6002–6011.
21. Fayyaz, S. 2018. "A Review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 & E-commerce as New Economic Statistics Products." The 16th Conference of IAOS OECD Headquarters, Paris, France. http://www.oecd.org/iaos2018/programme/IAOS-OECD2018_Fayyaz.pdf.
22. Fefer, R. F. 2018. "The Need for U.S. Leadership on Digital Trad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s://www.jec.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360bf9b8-a1d2-48e8-8114-539a654df7e4/fefer testimony us digital trade.pdf.
23. Gnangnon, S. K., and H. Iyer. 2018. "Does Bridging the Internet Access Divide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Countrie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Trade in Services Market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2(1): 61–77.
24. Gomez-Herrera, E., B. Martens, and G. Turlea. 2014. "The Drivers and Impediment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the EU."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8: 83–96.
25. Gravier, M. J. 2018. "2018 Customs & Regulations Update: 10 Observations on the 'Digital Trade Transformation'." *Logistics Management* 57(1): 36–39.
26.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2018. "Growth, Trade, and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86(1): 37–83.
27. Helpman, E., O. Itskhoki, and S. Redding. 2010.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etrica* 78(4): 1239–1283.
28. Horowitz, J. 2015.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s Digital Trade Roundtable: Discussion Summa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 10: 1–12.
29. Hortaçsu, A., F. Asís Martínez-Jerez, and J. Douglas. 2009. "The Geography of Trade in Online Transactions: Evidence from Ebay and MercadoLib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1(1): 53–74.
30. Katsimi, M., and T. Moutos. 2011. "Inequality and the US Import Demand Fun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0(3): 492–506.
31. Lee, J., and D. Wie. 2015. "Technological Change, Skill Demand, an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World Development* 67: 238–250.
32. Lendle, A., M. Olarreaga, S. Schropp, and P. L. Vézina. 2016. "There Goes Gravity: Ebay and the Death of Dist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6(591): 406–441.
33. Lim, G. C., and P. D. McNelis. 2016. "Income Growth and Inequality: The Threshold Effects of Trade and Financial Openness." *Economic Modelling* 58: 403–412.
34. Lin, F. 2015.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4(3): 409–428.
35. Lin, F., and D. Fu. 2016. "Trade, Institution Qua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Development* 77: 129–142.
36. Lipton, A., T. Hardjono, and S. Pentland. 2018. "Digital Trade Coin: Towards a More Stable Digital Currency."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5(7): 155–180.
37. Liu, H., C. Fang, and S. Sun. 2017. "Digital Inequality in Provincial China." *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49(10): 2179–2182.
38. Ma, S., Y. Chai, and H. Zhang. 2018a. "Ris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 in China."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6(3): 63–87.
39. Ma, S., Y. Chai, J. Wang, and Y. Duan. 2018b.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Global Vision of Creating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Global Trade and Customs Journal* 13(4): 157–167.
40. MacLeod, J. 2018. "Using Digital Trade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Bridg Africa* 7(2): 8–11.
41.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42. Meltzer, J. P. 2015. "A New Digital Trade Agenda." E15 Initia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www.e15initiative.org/.
43. Nguyen, Q. 2017. "'Mind the Gap?'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ividual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0: 92–105.
44. Noh, Y. H., and K. Yoo. 2008. "Internet,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0(6): 1005–1016.
45. Ono, H. 2005. "Digital Inequality in East Asia: Evidence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Asian Economic Papers* 4(3): 116–139.

- 46.Ozcan, B. 2018.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Turkey." *Eurasian Economic Review* 8(1): 93-113.
- 47.Polpibulaya, S. 2015. "Trade Open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https://tigerprints.clemson.edu/all_theses/2505.
- 48.Rattsø, J., and H. E. Stokke. 2013. "Trade, Skill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1(3): 419-431.
- 49.Rukanova, B., S. Henningsson, H. Z. Henriksen, and Y. H. Tan. 2018. "Digital Trade Infrastructur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mplex Systems Informatics and Modeling Quarterly* 14: 1-21.
- 50.Seuba, X., C. Geiger, and J. Penin (eds). 2018.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igital Trad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Global Perspectives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CEIPI-ICTSD* (5).
- 51.Terzi, N. 2011.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mployment."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4: 745-753.
- 52.Van Reenen, J. 2011. "Wage Inequality, Technology and Trade: 21st Century Evidence." *Labour Economics* 18(6): 730-741.
- 53.Vemuri, V. K., and S. Siddiqi. 2009. "Impact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 Panel Study Using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3(4): 458-484.
- 54.Wang, Y., and J. Li. 2017. "ICT's Effect on Trad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conomics Letters* 155: 96-99.
- 55.Weber, R. H. 2010. "Digital Trade in WTO-Law -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Ahead."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5(1): 1-24.
- 56.Xing, Z. 2018.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and E-commerce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15(3): 565-586.
- 57.Yap, W. W., T. Sarmidi, A. H. Shaari, and F. F. Said. 2018. "Income Inequality and Shadow Economy: A Nonparametric and Semipara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45 (1): 2-13.
- 58.Yushkova, E. 2014. "Impact of ICT on Trade in Different Technology Groups: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11(1-2): 165-177.
- 59.Zakaria, M., X. Junyang, and B. A. Fida. 2016. "Trade Openness, Malnourish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South Asia."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15(4): 347-371.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Zhou Liping and Yang Bo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such as high efficiency, covenant-lite and boundary weakening, are reshaping the competitive pattern of global trade. This provides us with new ideas for interpreting and alleviat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dimensions of space,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and unbalanced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asures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as well as sorts out the causal mechanism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may neutralize the gravity model, the "new-new" trade theory and the measures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utual impact between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has not been empirically proven. The future studies can be extended from the new features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its estimation methods and its reverse causality with income inequality.

Keywords: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come Inequality, Digital Technology

JEL Classification: F16, L81, O15

(责任编辑:陈永清)